

文章编号:1003-207(2019)08-0047-10

DOI:10.16381/j.cnki.issn1003-207x.2019.08.005

晋升激励、地域偏爱与企业环境表现： 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陈秋平¹, 潘越², 肖金利³

(1.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3.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是影响地方政府官员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本文以 2009—2015 年沪深 A 股上市企业为样本, 探讨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 并分别从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两个角度切入分析这种影响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换届后, 若继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 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得到改善; 而若继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 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发生恶化。这一研究结论在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改变度量指标、考虑滞后反应、进行安慰剂测试、调整样本及控制其他可能的遗漏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 异地调任的继任官员出于晋升激励的动机而倾向于降低地方环境治理水平; 而本地调任官员出于对曾经任职地区的地域偏爱而更重视当地环境治理。本文创新性地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视角探讨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 为理解地方官员的决策模式和企业环境责任行为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 晋升激励; 地域偏爱; 企业环境表现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伴随着严重的环境问题, 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恶化等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原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指出“GDP 增长透支了子孙的蓝天碧水”。在严峻的环境问题中, 企业是造成自然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原国家环保局统计显示企业在污染物排放中的比重达到 80% 以上。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生存和发展只注重经济效应而不愿承担环境社会责任, 过度消耗资源并排放废弃物, 甚至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这些严峻的环境形势并非短期内形成的, 而是与我国官员的晋升考核机制密切相关。

行政分权带来的激励使地方政府及官员掌握着包括行政审批及资源能源环境等各种稀缺资源的决

策分配权^[1], 地方政府成为环境规制的重要主体之一。但是, 分权制度改革之后, 地方政府主要职能是发展经济, 而污染类企业往往是区域的纳税大户, 地方官员围绕着经济增长速度展开的政绩晋升锦标赛使其有动机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甚至以牺牲区域环境为代价, 环境制度安排缺乏约束力^[2]。学者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是影响环境和能源问题的重要因素^[3-4]。因此, 我国目前体制下, 地方官员需要平衡发展辖区经济和保护区环境之间的关系^[5]。

除晋升激励外, 近年来, 学术界开始从地域偏爱的角度研究地方官员对微观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学者研究发现, 国家领导人家乡的夜间灯光亮度在其任职期间显著增强^[6], 新任部长会增加其来源地的专项转移支付^[7], 省委书记、省长的身份认同能促进家乡经济增长^[8-9], 核心政府官员对其曾经任职地区的地域偏爱将提高该地区的政府补助^[10]。因此, 地域偏爱和晋升激励都是影响地方官员决策的重要因素。那么, 当地方官员更替时, 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会受到什么影响? 官员的异质性决定了不同来源的官员会根据自身激励实施差异化的政策^[11-12]。从晋升激励的角度看, 异地调任的新任官

收稿日期: 2017-10-12; 修订日期: 2018-02-1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572158, 71772155);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云顶课题资助项目(YD20180206)

通讯作者简介: 肖金利(1986-), 男(汉族), 湖南邵阳人,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公司治理、公司财务, E-mail: jlxiao@xmu.edu.cn.

员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及环境,且可能出于政绩需要放松对辖区内支柱企业的环境规划;而本地调任的新任官员基于对本地的地域偏爱而更重视当地的环境问题并加强环境治理,引导当地企业承担环境责任。

本文选取2009—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官员更替对当地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分别考察异地调任官员和本地调任官员的差异性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这种影响背后的作用机制。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第一,目前学术界对官员更替与企业决策行为的研究主要围绕企业投资^[13-14],而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研究较为匮乏^[15]。本文创新性地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情结的视角切入,探讨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拓展了地方官员影响企业微观行为的研究范围。第二,不同于以往文献中企业出于公司财务状况及公司治理的考虑或受政策及公共压力等而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研究,本文选取地方官员更替这一外生事件为出发点,能够完整而清晰地揭示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背后的政治考量,丰富了现有关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动因的研究。第三,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官员更替会影响企业的环境表现,且该影响在区分继任官员来源后有不同表现,文章还进一步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的影响,这些多层次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和学术界更加准确地理解企业环境决策行为。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学术界普遍认为,与地方政府进行良性互动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意义重大。根据寻租理论和交换理论,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政治关联获得非市场的稀缺资源或规避制度风险^[14],路晓燕等^[16]认为政府施加压力是推进企业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因此,研究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需要考虑地方官员的影响。

我国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使得地方官员的更替成为常态,官员的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官员会根据自身激励实施差异化的政策。而由于地方官员在财政分权后掌握着当地经济政策较大的决策权,因此,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不连续性将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现有研究表明新任官员的来源对官员更替带来的经济效应有显著影响^[11-12],戴亦一等^[15]指出本地调任的官员一般不会轻易打破原先的政企关系格

局,更有动机延续执行先前的资源分配方案,而异地调任的官员更可能收回或减少对辖区内企业的优惠。因此,在考察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时需要区分新任官员来源进行分析。

官员更替影响辖区内企业环境表现的两个可能动机是地域偏爱和晋升激励。从地域偏爱角度考虑,地方官员由于情系故地而对其曾经任职地区的企业产生地域偏爱。陈运森和崔宸瑜^[10]指出地方官员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熏陶下产生的地域偏爱情结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而该地域偏爱可能来自其曾经在某地任职的工作经历。国外学者研究证实了官员在任期内存在地域偏爱,国家领导人家乡的夜间灯光亮度在其在任期间显著增强^[6]。李书娟和徐现祥^[8]、李书娟等^[9]则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出发考察省委书记、省长对其家乡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指出乡土观念广泛存在且影响深远。因此,从身份认同经济学角度看,省级官员有动机促进家乡发展。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环境保护也由此成为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来自本地调任的新任官员基于对地域偏爱而更可能重视当地的环境问题并加强环境治理,引导当地企业承担自身环境责任。

而从晋升激励角度考虑,在任官员相对前任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决定了新任官员有动机实施差异化策略以超越前任表现从而获得晋升机会^[11-12]。分权制度下的晋升锦标赛要求地方官员向上级传递可置信的政绩信号,而长期导向的项目难以形成有效信号,因此官员会积极寻求短期政绩项目作为信号载体向上级表现政绩,这就导致某些行业及项目的过度投资,并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17]。相对于本地调任的官员而言,异地调任的新任官员更有动机牺牲环境以寻求短期经济增长,且异地调任的新任官员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及环境,因而可能在上任初期对环境监管不足。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地方市委书记变更后,若新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得到改善;若新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发生恶化。

假设2:地方市委书记变更后,本地调任的新任官员改善企业环境表现的可能动机是地域偏爱;异地调任的新任官员忽视企业环境表现的可能动机是晋升激励。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9—2015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按照以下标准筛选样本：(1)剔除 ST 和*ST 类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3)剔除行政区划调整的数据；(4)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相关数据来源情况如下：

(1)环境表现数据：来自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企业环境表现数据库收录的各级环保部门发布的环境违法事实行政处罚决定等环境监管信息。为了消除企业注册地与实际运营地不一致的情况，仅保留企业注册所在地的政府部门发布的企业环境监管信息。

(2)官员更替数据：钱先航^[18]指出，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主要集中于地方党委。因此，本文参考以往文献的做法^[14]，使用市委书记的变更作为官员更替的代理变量。

(3)其他区域经济数据和财务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泰安(CSMAR)数据库。

3.2 模型说明

为检验上文提出的假设，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EP_{it} = \beta_{in} + \beta_t + \beta_r + \beta_1 * Change_{it} + \beta * \sum Controls_{it} + \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EP_{it} 为企业环境表现； $Change_{it}$ 为官员更替。 β_{in} 表示行业的固定效应； β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β_r 表示地区的固定效应； $Controls_{it}$ 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含义及度量如下：

(1)企业环境表现：企业环境违规违法的次数，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2)实验变量：本文考察的是官员更替影响年份的企业环境表现，因此，参考以往文献的做法^[14-15]，如果在上半年进行更替，将官员更替年份定义为当年；如果在下半年发生更替，将官员更替年份定义为下一年。

(3)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研究企业环境表现的相关文献^[19]选取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公司风险及股权集中度等。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

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见下表。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

含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因变量	企业环境表现	EP	环境违规违法的次数，加 1 取自然对数
实验变量	官员更替	Change	6 月 30 号前发生市委书记更换，当年取 1；6 月 30 号后发生市委书记更换，下一年取 1；其余年度取 0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盈利能力	ROA	资产净利率
	公司风险	Lev	资产负债率
控制变量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行业	Industry	行业虚拟变量
	地区	City	城市虚拟变量
	年份	Year	年份虚拟变量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首先对连续性变量的异常值按照 1%分位数进行了 Winsorize 处理，处理后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2。

4.2 回归结果与分析

4.2.1 官员更替与企业环境表现

地方官员的异质性决定了不同来源的官员会根据自身激励实施差异性政策，从而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由此，本文将区分继任官员来源以考察官员

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分别考察本地官员调任市委书记和异地官员调任市委书记的影响。

表 3 报告了官员更替和企业环境表现的检验结果，由表中结果可知，地方政府换届后，若新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得到改善；而若新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恶化，这和前文的理论分析一致。

4.2.2 稳健性检验

(1)控制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20]，在原模型中加入地区 * 年份固定效应，排除不同年份的地区因素的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察值
EP	0.0149	0.0754	0.0000	0.4771	11179
Change	0.1670	0.3730	0.0000	1.0000	11179
Change_b	0.0968	0.2969	0.0000	1.0000	11179
Change_w	0.0695	0.2543	0.0000	1.0000	11179
Size	21.8866	1.3668	18.6674	25.7819	11179
Lev	0.4952	0.2195	0.0587	1.1037	11179
ROA	0.0363	0.0593	-0.2147	0.2214	11179
Top1	35.5275	15.5761	8.4100	75.7340	11179

表 3 官员更替与企业环境表现

变量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1)	(2)	(3)	(4)
Change	-0.0041** (-2.04)	-0.0041** (-2.06)	0.0044* (1.88)	0.0044* (1.8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1179	11179	11179	11179
Adj_R ²	0.1791	0.1838	0.1791	0.1837

注：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影响。表 4 报告了引入地区 * 年份固定效应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官员更替和企业环境表现的结果与上文一致，本文结论仍然稳健。

表 4 稳健性检验：控制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变量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1)	(2)	(3)	(4)
Change	-0.0037* (-1.88)	-0.0038* (-1.90)	0.0044* (1.90)	0.0044* (1.8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1179	11179	11179	11179
Adj_R ²	0.0730	0.0805	0.0732	0.0806

(2) 更换企业环境表现指标

为进一步确认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以企业环境违规的虚拟变量作为企业环境表现的代理指标

$EPdum_{it}$ ：企业环境违规违法取 1，否则取 0。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对官员更替和企业环境表现进行再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表 5 稳健性检验：更换企业环境表现指标

变量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1)	(2)	(3)	(4)
Change	-0.1823** (-2.26)	-0.2088** (-2.50)	0.1743** (2.44)	0.1656** (2.1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097	6097	6097	6097
Pseudo R ²	0.2634	0.2894	0.2632	0.2889

(3) Heckman 两阶段检验

地方官员更替考核需要综合考虑其政绩等，而企业的环境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官员的政绩进而影响其更替。本文参考徐业坤等^[14]的做法，利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对官员更替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构建官员更替的 probit 模型，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MR)，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6。由回归结果可知，IMR 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官员更替和企业环境表现的结果仍与上文一致，这说明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后，本文结论仍然稳健。

表 6 稳健性检验：Heckman 两阶段检验

变量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1)	(2)	(3)	(4)
Change	-0.0055** (-2.10)	-0.0054** (-2.08)	0.0068** (2.43)	0.0069*** (2.46)
IMR	-0.0044 (-0.30)	-0.0037 (-0.25)	-0.0057 (-0.80)	-0.0061 (-0.8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388	6388	6388	6388
Adj_R ²	0.1823	0.1894	0.1825	0.1896

(4) 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是否有其他遗漏变量对研究结论造成偏差，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21]，通过随机选择更替官员的分布以展开安慰剂检验：首先，为每个地

区随机模拟分配更替官员;第二,通过这些随机产生的模拟官员更替地区分布生成模拟的官员更替解释变量;第三,利用模拟的官员更替解释变量对企业环境表现指标进行回归。为了提高安慰剂检验的准确性,重复上述过程 1000 次。利用模拟的官员更替解释变量回归 1000 次后的结果显示,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和为负的占比差异较小,即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处理效应不是其他遗漏变量造成的。该部分进一步验证本文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5)滞后反应

为了考察官员更替对企业的环境表现是否有滞后效应,本文参考龙小宁和黄小勇^[22]的做法在模型中加入官员更替的滞后项。由下表结果可知,滞后项均不显著,而官员更替和企业环境表现的结果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说明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后,本文结论仍然稳健。

表 7 稳健性检验:滞后效应

变量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1)	(2)	(3)	(4)
Change	-0.0040*	-0.0041*	0.0048*	0.0047*
(0)	(-1.88)	(-1.92)	(1.89)	(1.85)
Change	-0.0006	-0.0006	0.0002	0.0002
(-1)	(-0.27)	(-0.28)	(0.07)	(0.0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582	9582	9582	9582
Adj_R ²	0.1975	0.2031	0.1975	0.2031

(6)剔除直辖市样本

直辖市属于省一级,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表 8 报告了剔除直辖市样本后的检验结果,并不改变原有结论。

表 8 稳健性检验:剔除直辖市

变量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1)	(2)	(3)	(4)
Change	-0.0055**	-0.0055**	0.0067**	0.0068**
(-2.07)	(-2.07)	(-2.05)	(2.28)	(2.32)
Controls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160	5160	5160	5160
Adj_R ²	0.1952	0.2021	0.1953	0.2023

(7)剔除交叉上市样本

根据约束理论,通过境外上市的公司面临着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责任和更严厉的监管。企业选择环境治理决策时需要考虑更多的司法约束和声誉约束问题,因此包含 A+H 交叉上市的样本观测值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本文剔除 A+H 交叉上市样本后进行检验的结果见表 9,结果表明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表 9 稳健性检验:剔除 A+H 股交叉上市

变量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1)	(2)	(3)	(4)
Change	-0.0043**	-0.0043**	0.0040*	0.0039*
(-2.14)	(-2.14)	(-2.17)	(1.72)	(1.70)
Controls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773	10773	10773	10773
Adj_R ²	0.1633	0.1683	0.1632	0.1682

(8)控制官员个人特征

官员个人特征的差异可能会造成研究结论的偏差,因此本文在原模型中控制地方官员的任期及年龄等个人特征变量。结果显示,官员更替和企业环境表现的结果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本文结论仍然稳健。

表 10 稳健性检验:控制官员个人特征

变量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1)	(2)	(3)	(4)
Change	-0.0053**	-0.0052**	0.0069***	0.0069***
(-2.02)	(-2.02)	(-1.99)	(2.43)	(2.46)
Tenur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g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trols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388	6388	6388	6388
Adj_R ²	0.1825	0.1896	0.1826	0.1898

5 进一步研究

5.1 机制检验

前文检验结果显示地方官员更替后,若新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得到改善;而若新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恶化。一方面,来自本地调任的新任官员基于对本地的地域偏爱而可能更重视当地的环境问题并加强环境治理。另一方面,相对于本地调任的官员而言,异地调任的新任官员出于政治晋升激励而更有动机牺牲环境以寻求短期经济增长,且异地调任的新任官员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及环境。因此,官员更替影响辖区内企业环境表现的两个可能动机是地域偏爱和政治晋升激励。接下来,本文将对官员更替影响企业环境表现的可能渠道进行检验。

5.1.1 地方环境治理水平

为了考察地方环境治理水平是否为官员更替影响企业环境表现的可能渠道,本文采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环境保护支出比例作为地方环境治理投资(*Greeninvest*)的代理指标,然后将地方环境治理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在此之前,本文首先考察官员更替与地方环境治理投资的关系,表 11 中(1)、(3)的因变量为地方环境治理投资,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换届后,若新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的环境治理投资显著增加;而若新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当地的环境治理投资显著降低。表 11 中列(2)、(4)为将地方环境治理投资加入回归后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官员更替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且符号与之前一致,而 *Greeninvest* 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地方环境治理水平越高的地区,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越好,这与现有文献结论一致。以上实证结果

表 11 机制检验:地方环保治理投资

变量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Greeninvest	EP	Greeninvest	EP
	(1)	(2)	(3)	(4)
Change	0.0016*** (9.18)	-0.0041** (-2.04)	-0.004*** (-2.06)	0.0043* (1.86)
Greeninvest		-0.0239 (-0.21)		-0.0398 (-0.36)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1179	11179	11179	11179
Adj_R ²	0.6838	0.1838	0.6815	0.1837

间接说明,地方官员发生更替后,本地调任的新任官员出于地域偏爱而更重视当地的环境问题并加强环境治理;异地调任的新任官员基于短期政绩的考虑或者由于岗位适应期而降低当地的环境治理水平。

此外,本文采用“中国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以下简称 PITI)作为衡量地方政府环境信息监管力度的指标,考察官员更替后地方环境监管力度的变化。本文首先考察官员更替与地方环境监管力度的关系,表 12 的列(1)、(3)的因变量为地方环境监管力度,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换届后,若新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的环境监管力度显著增强。表 12 的列(2)、(4)显示了将地方环境监管力度加入回归后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官员更替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且符号与之前一致。

表 12 机制检验:地方环境监管力度

变量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PITI	EP	PITI	EP
	(1)	(2)	(3)	(4)
Change	1.9716*** (8.93)	-0.0047** (-2.33)	0.0412 (0.16)	0.0044* (1.85)
PITI		0.0003*** (3.36)		0.0003*** (3.1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976	10976	10976	10976
Adj_R ²	0.8191	0.1889	0.8177	0.1887

5.1.2 非正常换届

本文样本市委书记的任期均值为 3.37 年。因此,本文参考徐业坤等^[14]的做法,将任期低于 3 年的样本视为非正常换届 *Change_new*,否则为正常换届。由表 13 的结果可知,当任期低于 3 年(即非正常换届)时,若新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恶化;而若新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没有显著变化。这可能是由于离任官员的非正常换届影响了本地调任官员的地域偏爱发挥作用。

5.2 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5.2.1 政治关联

根据寻租理论和交换理论,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政治关联获得非市场的稀缺资源或规避制度风险^[14]。因此,相比无政治关联企业,有政治关联的

表 13 机制检验:非正常换届

变量	离任市委 书记任期<3年		离任市委 书记任期<5年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1)	(2)	(3)	(4)
Change	-0.0043	0.0109*	-0.0057*	0.0108***
new	(-1.12)	(1.73)	(-1.81)	(2.60)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272	6272	6272	6272
Adj_R ²	0.1917	0.1919	0.1919	0.1923

企业环境表现受到官员更替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将分别考察是否有政治关系对官员更替作用的影响。表 14 的回归结果显示,官员更替对于有政治关系企业的环境表现影响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更为明显,这与前文分析一致。

表 14 异质性检验:政治关联

变量	有政治关联		无政治关联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1)	(2)	(3)	(4)
Change	-0.0056*	0.0077**	-0.0033	0.0010
	(-1.93)	(2.26)	(-1.23)	(0.31)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150	4150	7029	7029
Adj_R ²	0.2803	0.2808	0.2104	0.2103

5.2.2 产权性质

国有企业所有者的特殊性决定其经营活动目的具有特殊性,即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追求政治目标,在维护社会稳定、创造就业岗位、保护周边环境等方面都受到来自政府更多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因此,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环境表现受到官员更替的影响更为明显。为了考察官员更替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影响,本文将总样本按实际控制人类别进行分组回归,表 15 为分样本估计结果。由表中可知,官员更替对于国有企业的环境表现影响比民营企业更为明显。

表 15 异质性检验:产权性质

变量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1)	(2)	(3)	(4)
Change	-0.0068**	0.0067*	-0.0000	-0.0004
	(-2.10)	(1.83)	(-0.00)	(-0.14)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202	6202	4452	4452
Adj_R ²	0.2616	0.2615	0.1842	0.1842

5.2.3 重污染行业

地方官员出于政绩晋升的需要有动机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降低环保门槛、干预建设污染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和审批^[23]。重污染企业作为当地的主要排污企业,往往也是纳税大户,相比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其环境表现受到官员更替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将样本分为“重污染行业组”与“非重污染行业组”分别进行检验。其中,重污染行业界定标准为环保部 2010 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中认定的重污染行业。表 16 报告了重污染行业的分组估计结果,从表中可知,官员更替对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环境表现影响比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更为明显。

表 16 异质性检验:重污染行业

变量	重污染行业		非重污染行业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本地调任	异地调任
	(1)	(2)	(3)	(4)
Change	-0.0077*	0.0080*	-0.0014	0.0008
	(-1.80)	(1.71)	(-0.99)	(0.4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837	4837	6342	6342
Adj_R ²	0.2149	0.2149	0.1583	0.1582

5.3 区域的异质性分析

5.3.1 不同经济区

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的差异,东中西部经济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具有显著差异且存在产

业发展梯度。其中,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相对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在面临短期经济增长和治理辖区内污染及保护环境之间的权衡时可能更容易牺牲资源及环境^[24]。本文将总样本按不同经济区进行分类并分别回归,表 17 为分样本估计结果。从表中可知,官员更替对于东部地区的企业环境表现影响比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

表 17 异质性检验:不同经济区

变量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本地调任 (1)	异地调任 (2)	本地调任 (3)	异地调任 (4)
Change	-0.0046** (-1.99)	0.0068* (1.95)	-0.0060 (-1.41)	0.0029 (0.8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035	7035	4144	4144
Adj_R ²	0.1834	0.1833	0.2195	0.2193

5.3.2 不同腐败程度地区

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较为严重,而且往往缺乏有效的司法监督。本文采用中国检察年鉴中各地区的腐败案件数据作为腐败程度的代理指标,根据各地区腐败程度将样本分为“高腐败地区组”与“低腐败地区组”分别进行检验。表 18 报告了腐败程度分组的检验结果,从表中可知,官员更替对于高腐败地区的企业环境表现影响比低腐败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

表 18 异质性检验:地区腐败程度

变量	高腐败地区		低腐败地区	
	本地调任 (2)	异地调任 (3)	本地调任 (5)	异地调任 (6)
Change	-0.0063** (-2.09)	0.0072* (1.78)	-0.0030 (-1.01)	0.0025 (0.8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it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5712	5712	5467	5467
Adj_R ²	0.1833	0.1832	0.2265	0.2264

6 结语

地方官员围绕着经济增长速度展开的政绩晋升锦标赛使其有动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谋求短期政绩,官员的晋升激励是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而近年来,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文献从地域偏爱的角度研究发现地方主政官员可能对曾经任职的地区产生身份认同或者地域偏爱。因此,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地方官员行为决策的两个重要动因。

本文以 2009—2015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地方政府换届后,若继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得到改善;而若继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将恶化。这一研究结论在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更换度量指标、控制滞后反应、安慰剂测试、调整样本及控制其他可能的遗漏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若继任官员来自本地调任,则当地的环境治理水平提高;而若继任官员来自异地调任,则当地的环境治理水平降低。(3)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表现的作用会受到企业特征和区域特征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1)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来看,晋升激励和地域偏爱情结是影响地方政府官员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在以 GDP 为核心的政绩锦标赛激励下,异地调任的新任官员有动机放松对辖区内支柱企业的环境规制以谋求短期经济增长;而本地调任的继任官员基于对其曾经任职地区的地域偏爱而更重视当地的环境问题。但是,目前的官员任职回避制度对官员的任职经历及曾经主政地区的考虑尚显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官员的人事控制和治理机制。(2)分权制度下的晋升锦标赛激励着地方官员积极寻求短期政绩,甚至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而这种晋升激励由于不同区域特征有着差异化的表现。因此,应该进一步强调绿色政绩考核的重要性,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征制定差异化的环保绩效考核体系,激励地方官员积极推动经济绿色转型。(3)对企业而言,由于面临着环境治理和经济产出最大化之间的权衡取舍,而缺乏治理污染及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特别地,当前我国多数企业环境治理的推动力更多地来自于当地政府的压力,因此,一方面,应该加强地方政府对

企业环境治理方面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亟需提高各级环保部门的独立性和执法效率,使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和环保的自觉性及积极性。

参考文献:

- [1]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 2007, (7): 36-50.
- [2] 周耀东. 利益集团理论[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28(4): 106-111.
- [3] 李爱华, 宿洁, 贾传亮.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协调发展及一致性模型研究——宏观低碳经济的数理分析[J]. 中国管理科学, 2017, 25(4): 1-6.
- [4] 潘伟, 熊建武. 电力消耗、经济增长与 CO₂ 排放量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面板数据[J]. 中国管理科学, 2018, 26(3): 152-159.
- [5] 张凌云, 齐晔. 地方环境监管困境解释——政治激励与财政约束假说[J]. 中国行政管理, 2010, 297(3): 93-97.
- [6] Hodler R, Raschky PA. Regional favoritism[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129(2): 995-1033.
- [7] 范子英, 李欣. 部长的政治关联效应与财政转移支付分配[J]. 经济研究, 2014, (6): 129-141.
- [8] 李书娟, 徐现祥. 身份认同与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 2016, 15(3): 941-962.
- [9] 李书娟, 徐现祥, 戴天仕. 身份认同与夜间灯光亮度[J]. 世界经济, 2016, (8): 169-192.
- [10] 陈运森, 崔宸瑜. 官员主政关系、地域偏爱与政府补助[J]. 中国会计评论, 2016, 14(4): 483-514.
- [11] 王贤彬, 徐现祥. 地方官员来源、去向、任期与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08, (3): 16-26.
- [12] 王贤彬, 徐现祥, 李郇. 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 2009, 8(4): 1301-1328.
- [13] 曹春方. 政治权力转移与公司投资: 中国的逻辑[J]. 管理世界, 2013, (1): 143-157.
- [14] 徐业坤, 钱先航, 李维安. 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3, (5): 116-130.
- [15] 戴亦一, 潘越, 冯舒. 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14, (2): 74-86.
- [16] 路晓燕, 林文雯, 张敏. 股权性质、政治压力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的经验数据[J]. 中大管理研究, 2012, 7(4): 114-136.
- [17] 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 经济研究, 2004, (6): 33-40.
- [18] 钱先航. 官员任期、政治关联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J]. 经济科学, 2012, (2): 89-101.
- [19] 沈洪涛, 黄珍, 郭肪汝. 告白还是辩白——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4, 17(2): 56-63.
- [20] Acharya VV, Baghai RP, Subramanian KV. Wrongful discharge laws and innovation[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4, 27(1): 301-346.
- [21] Li Pei, Lu Yi, Wang Jin.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6, 123: 18-37.
- [22] 龙小宁, 黄小勇. 公平竞争与投资增长[J]. 经济研究, 2016, (7): 147-157.
- [23] 仲伟周, 王军. 地方政府行为激励与我国地区能源效率研究[J]. 管理世界, 2010, (6): 171-172.
- [24] 汪克亮, 孟祥瑞, 杨宝臣, 等.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大气环境绩效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 (11): 59-76.

Promotion Incentive, Regional Favoritism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Listed Firms in China

CHEN Qiu-ping¹, PAN Yue², XIAO Jin-li³

(1. Xiamen National Accounting Institute, Xiamen 361005,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behavior choice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promotion incentive and their regional favoritism. Choosing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during 2009 and 2015 as a study sample, the influ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transition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s empirically studied. Meanwhile the mechanism behind this associa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transition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motion incentive and regional fa-

voritism. It is found that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would improve when the new official was from a same city. Meanwhile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would worsen when the new official was from a different city. These findings remain robust after a battery of robustness checks. After analyzing the effect 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it mainly because of promotion incentive of the new official from a different city, and regional favoritism of the new official from a same city. Not only the research on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motion incentive and regional favoritism of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is enriched, but also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the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from a larger picture is offered.

Key words: promotion incentive; regional favoritism;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